



张岱年先生学谱

刘鄂培

杜运辉

编著

昆仑出版社



B261.5
20

张岱年哲学研究丛书

张岱年先生学谱

刘鄂培 杜运辉 编著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岱年先生学谱/刘鄂培,杜运辉编著. —北京:

昆仑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 - 7 - 80040 - 954 - 7

I. 张… II. ①刘… ②杜… III. 张岱年(1909—2004)—哲学思想—研究

IV. B26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9627 号

张岱年哲学研究丛书

张岱年先生学谱

刘鄂培 杜运辉 编著

责任编辑:张良村

责任校对:马 涛 韩 聪 吴信尧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

邮政编码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<http://www.jfwyph.com>

E-mail: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

印 刷:北京凌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80 千字

印 张:18.875

版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040 - 954 - 7

定 价:5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导 论

——岱宗巍立苍松劲，星火传承代有人



张岱年先生(1909—2004)是当代中国有卓越贡献的哲学家、中国哲学史专家。2009年5月是他诞辰100周年，辞世5周年。他出生于北京，祖籍为河北省献县(20世纪50年代划归沧县)。父众清公名濂，字中卿，为晚清进士，改“庶吉士”，肄司法政，后任职翰林院编修，晚年嗜好“黄老之学”。岱年先生自幼受到家学熏陶，养成对中国传统文化、哲学的浓厚兴趣，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。

岱年先生一生70年的学术生涯，大多是在清华、北大度过的。他为中国文化、哲学的发展、进步而竭尽心力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

为了研究方便，《张岱年先生学谱》将其一生分为五个时期：

【一】幼年和青少年时期

(1909—1932)

1914年—1915年(5—6岁)，岱年先生入族人办的私塾，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四书》。1920年(11岁)到北京，上北京师范学校附小，念高小一年级。1923年(14岁)考入北师大附中试验班。1928年(19岁)于北师大附中的高中



班毕业。

在高中时期,他写有《评韩》一文,批评韩非重刑赏而轻教化的观点。此文是作文课内的习作,后由班主任汪震老师推荐,刊登于校内刊物《附中月刊》。1928年岱年先生于高中毕业时,还写有《关于列子》一文(刊登于《晨报》副刊1928年3月),对今本《列子》一书的真伪和列子其人作了翔实的考证。以上《评韩》、《关于列子》两文,在编辑《张岱年文集》第1卷(1989年,清华大学出版社)时未能找到,因此未编入。此次,我们编写这本“学谱”时,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,仅找到《关于列子》一文,遗憾的是《评韩》还是没有找到。

《关于列子》全文约8000言,其主要内容有:(一)论证今本《列子》出于赝作。(二)对梁任公的观点:列子“本《庄子》寓言中人物”(即列子实无其人,是虚构的)提出质疑。并从列子的姓名、师友、学术思想与后学、年代与邑里诸方面作了考证。(三)列出列子的生平略谱。《关于列子》一文论据翔实,论证清晰,功力深厚。此时,岱年先生只是年仅19岁的高中生。

1928年,岱年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。念的是教育系,而兴趣却在哲学。1931年岱年先生刚22岁,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,就写出《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》一文,发表于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。因为喜欢自学,不爱听课,学分不足,延长期一年,到1933年毕业。

【二】第一学术高峰时期

(1933—1948)

1933年是岱年先生一生中的重要一年,他受聘于清华大



学哲学系任助教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^①。

岱年先生的长兄张申府（又名崧年，1893—1986）是中国近代史上传奇性的人物。他喜好哲学，中、西、马哲学造诣深厚。1917年他从北大数学系毕业，是李大钊进行革命工作的重要助手，曾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建党的工作。1922年、1923年他在法国、德国先后发展周恩来、朱德入党。1923年回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，1931年至1936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。

申府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的6年里，时值岱年先生在北师大求学和去清华任助教的时候。长兄的指导，对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。

三大流派 三足鼎立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，外受帝国主义的入侵，战火横飞，割地赔款；内有军阀割据，内战不已，民生凋敝。帝国主义乘机扩大在华势力范围，瓜分中国，国家沦为半殖民地，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为了拯救国家、民族，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探寻救国之道。就在这国难当头的岁月里，中国哲坛上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。当时哲坛形成了三种思潮、三大流派：

（一）辩证唯物论。早在“五四”时期，辩证唯物论就已介绍到中国，而系统的理论介绍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李达

^① 曾有记者问：“您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是什么？”岱年先生回答：“到清华当助教，这是最幸运的事。……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。”（见张者采访录《文化自白书》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）



翻译的几本书在中国出版之后，尤以（日）河上肇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》（1930年出版）、（苏）西洛可夫《辩证唯物论教程》（1932年出版）影响深远。因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以前的唯物论，所以称之为“新唯物论”，它一经介绍到中国，就引起了哲坛的关注，备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，成为20世纪30年代哲坛上最新的、最富有生机的哲学。

（二）**西方哲学**。在20世纪30年代，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，如黑格尔学派、康德学派、柏格森主义、尼采的超人哲学，乃至国家社会主义等等，几乎西方现有的重要流派都出现于中国哲坛。其中影响较大的有：（1）实验主义。在“五四”运动时期，胡适将（美）詹姆士（W. James）、杜威（J. Dewey）的实验主义引进中国，曾经风靡一时，至30年代逐渐衰落，昔日的显赫地位为辩证唯物论所取代。（2）新实在论和逻辑实在论。30年代初，以金岳霖为首，先后引进了（英）穆尔（G. E. Moore）、罗素（B. A. W. Russell）和博若德（C. D. Broad）的新实在论和（奥地利）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（M. Schlick）的逻辑实证论。这些学派推崇逻辑解析法，显示出西方近代哲学中的科学内容，因此受到当时中国哲坛的重视，并占有重要的一席。

（三）**中国传统哲学**。经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冲击，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已无重大建树。此时，梁漱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出版，分析了西方、中国、印度三种文化哲学的不同，认为当今西方文化、哲学已过时，印度文化、哲学是未来的，因此文化、哲学应向中国转变，并提出所谓“中国文化之复兴”。

以上三大流派之间的关系如何？这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当时在辩证唯物论、西方哲学、中国哲学之间并非“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（《中庸》语），而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（孔子



语),其关系可简略归纳为“彼此对立,相互排斥,各不相容”,门户之限,壁垒森严。

理论基石 批评精神

中国未来文化与哲学将何去何从?在20世纪30年代初,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。1933年,岱年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,在长兄的指引下,他的学术思想日臻成熟,标志是奠定了他在哲学上的三个“理论基石”:

(一)辩证唯物论。年轻的岱年先生在长兄的指导下,阅读了一批辩证唯物论的经典原著,其思想光辉使他为之“心折”,并在《大公报》上先后发表了《辩证法与生活》(1932年)、《关于新唯物论》(1933年)、《辩证法的一贯》(1933年)等论文,以弘扬辩证唯物论哲学为己任。当他登上清华课堂讲授“哲学概论”时,就特意加入了辩证唯物论哲学,并高度赞扬它为“当代最伟大的哲学”。岱年先生一生信奉辩证唯物论,终生不渝。

(二)逻辑解析法。岱年先生在来清华执教的前后几年中,在长兄的指引下又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。他对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流派大都不能“契入”,唯对穆尔、罗素和石里克的“逻辑解析法”情有独钟,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内容。他赞赏“逻辑解析法”,写有《逻辑解析》(1933年),进而运用这一新的方法来分析哲学中的命题,写有《谭“理”》(1933年)、《论外界的实在》(1933年),先后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。在中国哲学中长期争论的问题有:(1)理与事谁先谁后?即理在事先,还是理在事中?(2)物存在于何处?即物是外在的实在,还是非外在的实在?这两个问题也是西方哲学争论





的问题。当时的新唯物论者一般都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证实必须经过实践,这是正确的。但岱年先生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——能用实践来证实的,难道就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吗?于是他运用逻辑解析法,层层推演,终于得出“理在事中”、“物是外在的实在”的结论。《谭“理”》、《论外界的实在》两文的发表,引起了当时中国哲坛的关注,有的学者誉称张氏兄弟的哲学是“解析的唯物论”^①。

(三)中国哲学。岱年先生自幼受家学熏陶,加上个人的勤奋,在中学时期就已经有了中国哲学的深厚根底。20世纪30年代初,他在《大公报》上连续发表的论文有:《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》(1932年)、《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》(1932年)、《中国哲学中的非本体派》(1933年)、《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》(1933年)、《中国思想源流》(1934年)等文章。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分疏和深入研究,显示出他的深厚功力,中国哲学也成为他哲学体系的主体。

以上三个方面,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。

我们研究岱年先生的三个理论基石的形成,很有必要读一读他在《大公报·世界思潮》发表的一篇论文:《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》(1933年)。该文指出:“马克思主义哲学亦非无缺欠,而其他任何一派哲学都非无缺欠。哲学如此,他学亦然。”蓦然一看,似乎这句话与岱年先生高度赞誉辩证唯物论为“当代最伟大的哲学”有矛盾,而其实不然,这正说明了他勇于探求真理的科学态度。

在中国哲坛三足鼎立、相互批判的时候,有人对辩证法提



① 见孙道升《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》,《国闻周报》1935年第12卷第45期。

出责难：你们说“一切皆变”，那么“一切皆变”这句话变不变？如果你回答“变”或“不变”，都会否定“一切皆变”。这个责难很有分量，因为责难者抓住了当时的辩证法在理论上的一个缺欠——只谈“变”，不谈“常”（“不变”）。此时，岱年先生在《大公报·世界思潮》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：《关于新唯物论》和《道德之变与常》（1933年）。他在《关于新唯物论》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：“一切皆变，而变中有常。”这是说，在宇宙大流之中一切事物都在变，而“一切皆变”是规律，它是不变的“常”。也就是说，辩证法要谈“变”，同时也要谈“变”中之“常”（“不变”）。岱年先生提出的这个命题，源自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^①，他不仅回答了对辩证法的责难，而且从理论上丰富了辩证唯物论，使之在体系上更臻缜密。

岱年先生不仅是辩证唯物论的信奉者，而且还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开拓者。

“三流合一” 突破樊篱

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中国哲坛的三大流派相互批判、门户之限，壁垒森严。中西文化之间的“碰撞”达到白热化。这就提出两个问题：（一）中国传统文化、哲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，应否更新、转型？（二）中国文化、哲学的发展应走什么道路？这两个问题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。

1928年，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，给清华注入了新

^① 中国传统哲学有丰富的辩证思维，如谈“经（常）”，还谈“权（变）”；又如谈“易（变）”，还谈“不易（常）”（见《周易参同契》）。



的生机。同年,冯友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。1929年文学院成立,1931年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。同年,梅贻琦任校长,著名哲学家张申府应聘为哲学系教授。此外还有逻辑大师金岳霖,他已于1926年到清华任教授,接替赵元任(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)讲授逻辑学。他们是清华文学院、哲学系创建时期的重要力量。到1933年,年仅24岁的张岱年受聘清华文学院哲学系任助教,为清华哲学系增添了一份新的活力。

在清华文学院哲学系始建时期,堪称人才云集,学术思想极为活跃,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在当时的清华哲学系内,研究辩证唯物论者、研究西方哲学和逻辑学者、研究中国哲学者,不但学识深厚,而且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学风,在不同学科之间不是相互对立、攻击,而是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,心平气和,共同提高,与当时中国哲坛上三足鼎立、壁垒森严的情形形成强烈对比。

谈到清华哲学系的新学风,我们必须谈到张申府教授。他到校之后提出孔子、列宁、罗素“三流合一”的新思想。这里所说的孔子、列宁、罗素,不是指这三个人,而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传统、以列宁为代表的世界上方兴未艾的新传统、以罗素为代表的西方最好的传统^①。“三流合一”思想的提出,对清华哲学系新学风的形成起到重大作用,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今天看来,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巨大魅力。申府先生敢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坛提出“三流合一”思想,可见他的超前的智慧和恢弘的魄力。

“三流合一”思想之所以能在清华哲学系茁壮成长,这与

^① 见张申府《思与文》,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,第128页。



梅贻琦校长和冯友兰系主任有直接关系。梅校长在就任校长典礼上说“大学者非大厦之谓也，乃大师之谓也”，他高度尊重人才。冯友兰主任的办学方针，一是维护“学术尊严”，抵制当时的军阀对学术的干预；二是倡导“学术自由”，充分发挥学术民主。梅、冯两先生为“三流合一”思想的产生、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。

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。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，继而进逼华北。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，全国人民被迫进行了八年英勇的抗日战争。就在这社会动荡、经济凋零、人民流离失所的峥嵘岁月里，中国哲坛上却出现了一种可喜的景象——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时期。

在这一时期中，熊十力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张岱年等先生都同时建立了各有特色的中国哲学体系。其中，金、冯、张三位先生的哲学体系中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“三流合一”的思想，可见张申府提出的孔子、列宁、罗素“三流合一”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更新、转型过程中的重大作用。

肩负责任 三大贡献

岱年先生在长兄张申府“三流合一”思想的引导下，肩负起为中国传统文化、哲学更新、转型探寻一条新路的历史使命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一、为中国哲学的更新、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，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。

1936年，岱年先生发表了《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》一文，文中提出“今后哲学的一个新路，当是将唯物、理想、解

析，综合于一”^①。其中“唯物”指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，与中国传统唯物论、辩证思维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；“理想”指中国的道德理想与人生哲学，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所长；“解析”指“逻辑解析法”，这是西方哲学之所长。这就提出了一个融中、西、马哲学精华于一体的哲学新模式。1937年，岱年先生完成他的巨著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1948年又完成了他的《天人五论》，前者为史，后者为论，史论结合，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。

今天，我们从这个模式所汲取的西方哲学仅限于“逻辑解析法”来看，它是有缺陷的。但是从宏观上来看，这个新模式是开放性的，它所综合的内容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、丰富，所以它是富有生命力的。而且这个模式是第一个综合中、西、马哲学精华于一体的哲学模式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

二、为中国文化的更新、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，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。

1935年1月10日，陶希圣、王新命、萨孟武等10位文化人士联名发表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》（又称“一十宣言”）。同年5月，岱年先生针对该宣言的错误倾向，发表了《西化与创造》一文，指出“现在的中国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前，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，在这大过渡时代，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。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，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”^②。

同年3月，岱年先生发表了《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》，阐述了他自己的文化观的内涵：“兼综东西两方之长，发

① 《张岱年文集》第1卷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10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280页。

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，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，融合为一，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，但不要平庸的调和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。”^①因为文中提出“综合”、“创造”，所以学术界称之为文化“综合创造”说（亦有学者称之为“文化创造主义”），这是岱年先生文化观之雏形。

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，1987年，年近八旬的岱年先生仍以满腔热情投入当时的“文化热”中，根据世界形势和中国现实的巨大变化，发表了《综合、创新，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》^②一文，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——“文化综合创新论”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。这个新模式与其作为雏形的“综合创造”说一脉相承，都是融中、西、马文化之精华于一体。

“文化综合创新论”显示出三大优点：（1）超越近百年来的“体”、“用”之说，彻底摆脱了传统“体”、“用”说的束缚；（2）其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，适应于中国当前的需要；（3）合乎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新潮流。因此，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。

三、“兼和”思想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提升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石。

岱年先生的哲学观、文化观，二者从思维方式来说都是“综合创新”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我们必将提出质疑：这个新的思维方式是否存在其哲学基础？如果有，它又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。

从1942—1948年，岱年先生完成了他的哲学理论工

① 《张岱年文集》第1卷，第256页。

② 《张岱年文集》第6卷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489页。

作——《天人五论》，包括《哲学思维论》、《知实论》、《事理论》、《品德论》、《天人简论》，其中《天人简论》是对前四论的总结。岱年先生在《天人简论》中首次提出了“兼和”范畴，并作了界定。

在《天人简论》中，岱年先生提出宇宙大化有“三极”^①。何谓“大化”？它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宇宙观，认为宇宙是一个无穷无尽、无始无终的，而且生生不息、日新不已、永远变化的洪流，人与万物都同处于这个洪流之中。何谓“大化三极”？“极”即“顶点”、“至高”之义，即认为宇宙大化有三个最高、最重要之点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宇宙大化有三个特征：

(一)元极，“元”即根本，“元极者最根本的物质存在”(同上)，这是说宇宙是物质的，“宇宙大化”就是物质的发展、变化。

(二)理极，“理极者最根本的原理，即最普遍的规律”，并认为“最根本普遍规律曰两(中国哲学称‘对立’为‘两’)——(中国哲学称‘统一’为‘一’)”(同上)，亦即今日的辩证法。

以上两极为“宇宙大化”作出了质的定性：它是唯物的、辩证的，由此而区别于西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。

(三)至极，“至极者最高的价值准则”，并作了如下界定：

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。简云兼和，古代谓之曰和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。《易传》：“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。”……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，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。(同上)



① 《张岱年文集》第3卷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213页。